

神人之间:晋唐“桃源”形塑与流变

吴夏平

〔摘要〕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是后世“桃源”意象生成的基础。初唐对其认识主要是幽美之境和避隐之地。王维《桃源行》首次以“桃源”命篇,其后刘禹锡、韩愈等人均有以此为题之作。这些诗歌叙事略有不同,但整体上以仙事为中心。大历年间,武陵桃花观道童白日升仙,其后诗中仙事与道童故事合流,形成桃源神仙说一脉。《武陵记》和《武陵图经》作为地志,记述桃源较客观理性,但亦有尚异特点。桃源图则是对桃源的图像表达,是诗歌文本的图像再现,故以仙事为主。从刘禹锡和韩愈等事例,可知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中的桃源虽存在差异,但又往往统一在诗人意识中。据此可深掘“桃源”在空间和场域方面的地理批评意义,亦可深入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关键词〕 桃源;武陵;文学地理;历史地理;地理批评

“桃花源”是陶渊明创造的一个理想世界,这已成为常识。这种常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涉及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的本义。第二,陶集自刘宋以降的传播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第三,后人对“桃源”认识的变化。第四,桃源与武陵的关系。以往研究比较关注陶诗的接受和传播,主要从诗学史和诗歌史层面展开考察。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桃花源记》源出《搜神后记》,具有“杂传”性质。杂传内容繁杂,以记载鬼怪神异之事为其主要特点。那么,杂传的这种性质对后世认识桃源产生了哪些影响?后世基于陶氏原作,又是如何通过联想和想象,进而使“桃源”意象发生哪些新变化?《武陵记》《武陵图经》与桃源图对桃源的描摹有何不同,其根源何在?唐代桃源意象流变现象,具有哪些地理批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所思考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魏晋杂传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

陶渊明《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前者出于《搜神后记》,后者则载其本集。但后人在整理陶氏文集时,将二者合而为一,往往称之为“《桃花源记》并诗”,^①《记》似乎成了《诗》的序。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隋书·经籍志》载“《搜神后记》十卷,陶潜著”,^②将

吴夏平,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带头人(上海20023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古书籍制度文献整理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21AZW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看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页;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79页。

②魏徵等:《隋书》(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0页。

其著录于《搜神记》之后,两书均归史部杂传类。《隋志》所载“杂传类序”,详述杂传的起源、内容及性质,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尤须注意:其一,《史记》《汉书》载事有阙略,特别是“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多略而未书,可见正史无法包罗全部历史,需要杂传等其他形式来补充。其二,杂传源于阮仓和刘向,经由后汉和魏初而始兴。其三,杂传内容庞杂,举凡如风俗、耆旧、先贤、鬼物奇怪之事等均可纳入其中。魏晋以来史部书籍数量剧增,其中“杂传”一类,《隋志》载有217部、1286卷,若加上梁有而唐亡之书,则有219部、1503卷。^①这与当时著史以留名以及史官制度变化有关。《隋志》又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②由此可知,在后汉光武帝下诏修撰各地耆旧和先贤传时,杂传是记一时一地真人真事的。魏文帝曹丕编撰《列异传》,经众人模仿,创造了专叙鬼怪的新类型。《隋志》将《搜神后记》置于《列异传》之后,可见此书具有杂传的怪异性质。陶渊明好作杂传,当与魏晋以来此种风气有关。北齐阳休之将《五孝传》和《四八目》(《集圣贤群辅录》)收入十卷本《陶渊明集》,也反映了当时杂传的流行。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称陶渊明“心好异书”,^③指出他阅读和写作好异的特点。正史所载及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均称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据此可知陶渊明有撰制杂传的爱好。这是《桃花源记》杂传性质的社会和个人渊源。

《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经唐长孺与陈寅恪等人论辩而愈加清晰。唐先生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时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武陵是否真有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实,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④陈先生也指出《桃花源记》既有纪实的部分,又有寄托寓意的部分。这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陶渊明将桃花源与武陵联系起来的原因。笔者试图对此问题略加推测。《桃花源记》的作年,逯钦立系于义熙十四年戊午(418)。^⑤袁行霈系于永初三年壬戌(422),并指出王瑶系于永初二年辛酉(421),与逯钦立所系“相差无几”。^⑥是则《桃花源记》的作年,当在晋末宋初。依据逯氏系年,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五十四岁。是年十二月,宋王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改元元熙。显然,《记》和《诗》的写作均与此有关。

考武陵郡的设置时间,酈道元《水经注》卷三七“沅水”条,记为汉高祖二年(前205)。而《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原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又更名。”^⑦两书记载表明,汉初设置武陵郡是历史事实。但为什么称之为武陵呢?《晋书》载晋太守赵廞曾问主簿武陵汉寿人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潘京解释说:“《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为陵。于是名焉。”^⑧可见武陵之名取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止戈为武”,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如潘京所言,此地“与夷相接,为所攻破”。也就是说,因汉“夷”交界而战争频发,以“武陵”为其名,含有希望止息战争之意。考诸史籍,此地历来确实战事不断,而官兵往往为“夷”人所败。此问题至唐时依然未能很好地解决。例如,元和八年(813),窦常任朗州刺史时,就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联系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时间及相关政治事件,特别是刘裕弑晋安帝司马德宗一事来看,

①吴夏平:《史学转向与唐代“文之将史”现象》,《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②魏徵等:《隋书》(卷33),第982页。

③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3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46页。

④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63-164页。

⑤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第286页。

⑥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6),第485页。

⑦范曄:《后汉书》“志第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84页。

⑧房玄龄等:《晋书》(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5页。按:《后汉书》“志第二十二”“武陵郡”条,原注引《先贤传》,赵廞作“赵厥”,参见该书第3484页。

《桃花源记》中的“武陵”，至少包涵两层意思：一是希望“止戈”，平息“夷”汉之间的战争。二是有感于项羽曾弑义帝于郴，武陵又称义陵，^①因此还含有哀伤与义帝同样命运的晋安帝之意。从这个角度看，《桃花源记》的确既有纪实的部分，又有寓托的部分。所谓纪实是说其指向当时的政治事件，寓托则是说其怀有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

随着《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的传播，晋唐时期桃源与武陵的关系逐渐稳定。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太平广记》引《述异记》：“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②据此记载，似乎吴中亦曾被称为桃源。但很显然，吴中“桃源”是由陶渊明诗文引起的新的联想。因为“武陵”作为一个真实地名，不可能在吴中，此中所言“武陵源”实际等同于“桃花源”。以“武陵源”替代“桃花源”的现象，其实质还是桃源与武陵关系稳定性的反映。

将杂传所记故事改写为韵文，是六朝咏史诗的新发展。陶渊明之前已出现这种倾向，如袁宏《咏史诗二首》是直接依据杂史《续晋阳秋》所写。陶渊明编撰杂传《集圣贤群辅录》，将其中一些故事改写为诗歌，如《咏二疏》《咏三良》《咏贫士诗七首》等，都可以在《群辅录》中找到相关记载。从这个历史语境来看，陶渊明将具有杂传性质的《桃花源记》改写为《桃花源诗》，具有咏史诗转向的诗学史意义。^③《桃花源诗》既为《桃花源记》的改写，因此二者具有共通性，亦即借助怪异之事而寓托现实关怀和人生理想。后世对桃源的各种想象和联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

二、唐诗“桃源”意象衍展的总体进路

唐前涉及“桃源”和“武陵”的诗歌，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主要有周舍诗：“未凿武陵岩，先开仲长室。”^④沈君攸诗：“开筵临桂水，携手望桃源。”^⑤魏收诗：“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⑥宗懔诗：“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⑦庾信诗四首，其一：“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⑧其二：“行人忽枉道，直进桃花源。”^⑨其三：“逍遥游桂苑，寂绝到桃源。”^⑩其四：“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⑪徐陵诗：“桃源惊往客，鹤峤断来宾。”^⑫孔德绍诗：“今日桃源客，相顾失归途。”^⑬李巨仁诗：“避世桃源士，忘情漆园吏。”^⑭这些诗歌多为写景之作，桃源和武陵成为幽美景象的代称。尤可注意的是庾信诗，其“直进桃花源”“寂绝到桃源”都有避隐的意思。而“更寻终不见”，则是由《桃花源记》生出的“迷”的涵义。唐前将桃源与仙道相联系的诗作，仅《陈诗》卷二所载张正见《神仙篇》：“武陵桃花未曾落，已见玉女笑投壶。”^⑮由此来看，唐前由《桃花源记》和《诗》生发的诗歌

①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2），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70页。

②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10）“草木五”之“武陵桃李”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328页。

③蔡丹君：《六朝杂史、杂传与咏史诗学的发展——从阳休之〈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说起》，《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④周舍：《还田舍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4页。

⑤沈君攸：《赋得临水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28），第2111页。

⑥魏收：《棹歌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卷1），第2269页。

⑦宗懔：《和岁首望寒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1），第2326页。

⑧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之二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3），第2370页。

⑨庾信：《奉报赵王惠酒诗》，同上书，第2378页。

⑩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之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第2395页。

⑪庾信：《徐报使来止得一相见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第2402页。

⑫徐陵：《山斋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5），第2530页。

⑬孔德绍：《登白马山护明寺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6），第2722页。

⑭李巨仁：《登山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7），第2726页。

⑮张正见：《神仙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2），第2482页。

意象,主要有美境与避隐两种类型,“迷”及“仙”等意象虽亦出现,但用例甚少。

初唐涉及桃源或武陵者,有王绩、陈子良、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崔湜、李峤、宋之问、郑愔、上官昭容、乔侃、薛曜、张文成等人的诗作。其中卢照邻3首、宋之问2首,其他诗人都仅1首。在这些作品中,“桃源”一词的使用主要还是沿承齐梁以来的思路,大致可分为写景、归隐、仙道等类型。例如,薛曜《九城寻山水》:“菊浦桃源瞰九城,鸾歌凤啸忽将迎。千岩杂树云霞色,百道流泉风雨声。”^①诗题“寻山水”,诗中即以桃源状九城之景。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尊字》、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二十五)、乔侃《人日登高》、宋之问《宿清远峡山寺》等,从诗题与诗意来看,亦均为藉桃源或武陵以状目前之景。而骆宾王的“闻君招隐地,仿佛武陵春”^②及“时有桃源客,来访竹林人”,^③其中隐逸之义非常明显,“桃源客”作为隐士代名词亦由此始。崔湜诗“竹径桃源本出尘”,^④将归隐之意说得更加直接。将桃源与仙道相联系者,有王绩《游仙四首》(其三)“道士言无宅,仙人更有村。斜溪横桂渚,小径入桃源”,^⑤及郑愔《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何如游帝宅,即此对仙家”^⑥等作品。这些现象说明,初唐时期“桃源”与仙道的联系开始密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自盛唐以降,“桃源”意象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关涉“桃源”和“武陵”的诗歌数量增多。二是参与写作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刘长卿、钱起、戴叔伦、司空图、皎然、齐己等,经常在诗中使用“桃源”一词。三是意象发生新变,值得特别注意者有以下几点:

其一,赠行、送别诗中的异域想象。这类诗歌,由于送行者未至武陵,往往通过听闻或其他途径获得相关知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桃源的想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洛阳遥想桃源隔,野水闲流春自碧”^⑦;“花萼连枝近,桃源去路深”^⑧;“武陵花木应长在,愿与渔人更一寻”^⑨;“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⑩;“峡路猿声断,桃源犬吠深”^⑪;“闻近桃源住,无村不是花”^⑫等。这些异地想象之辞,往往是“遥想”,体现“隔”的特点。异域风物想象并非送行诗主题,作者所借助的这些想象之景,无非用以表达对远行之人的企羡、鼓励或安慰。这也反映了《桃花源记》和《诗》在唐代传存的一个侧面。

其二,实写武陵桃源。天宝中贬谪龙标的王昌龄,诗人包融、曹唐等人都到过武陵,写了不少以武陵为题的诗歌。其中有对武陵桃源的描写,如“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⑬;“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⑭。这些诗歌往往借桃源以表他意。特别是王昌龄的诗,明写武陵风物,暗中则抒发遭贬的愤懑之情。这类诗歌的另一特点是,诗中言及桃源风物,但均以“武陵”为题。这说明,诗中的“武陵”是作为历史地理名词使用的。“桃源”本为想象和虚构,但在实写武陵的诗作中,桃源往往等同于武陵。

其三,由桃源或武陵引起联想。这类情况多见于写武陵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诗歌。例如,李白称

①薛曜:《九城寻山水》,彭定求等:《全唐诗》(卷88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968页。

②骆宾王:《同辛簿简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全唐诗》(卷78),第842页。

③骆宾王:《畴昔篇》,《全唐诗》(卷78),第836页。

④崔湜:《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全唐诗》(卷54),第667页。

⑤王绩:《游仙四首》其三,《全唐诗》(卷37),第483页。

⑥郑愔:《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全唐诗》(卷106),第1105页。

⑦刘长卿:《送郭六侍从之武陵郡》,《全唐诗》(卷151),第1579页。

⑧戎昱:《送陆秀才归觐省》,《全唐诗》(卷270),第3017页。

⑨李端:《送马尊师》,《全唐诗》(卷286),第3270页。

⑩李端:《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全唐诗》(卷285),第3249页。

⑪武元衡:《送严侍御》,《全唐诗》(卷316),第3555页。

⑫张纘:《送友人归武陵》,《全唐诗》(卷702),第8072页。

⑬王昌龄:《留别武陵袁丞》,《全唐诗》(卷140),第1427页。

⑭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二,《全唐诗》(卷143),第1451页。

黟县为小桃源：“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①五代时期徐铉也说“尝闻黟县似桃源”。^②由李诗中的“小桃源”、徐诗中的“似桃源”，可知他们将黟县比作桃源，是创作时产生的联想。皮日休曾作《太湖诗》二十首，其中之一为《桃花坞》：“坞名虽然在，不见桃花发。恐是武陵溪，自闭仙日月。”^③陆龟蒙有和作：“空经桃花坞，不见秦时人……桃源不我弃，庶可全天真。”^④皮诗中的“恐是”、陆诗中的“庶可”，有类似、差不多的意思。这些不确定的说法，反映了太湖桃花坞与武陵桃源的相似性。陆希声《阳羨杂咏十九首》之一为《桃花谷》：“君阳山下足春风，满谷仙桃照水红。何必武陵源上去，涧边好过落花中。”^⑤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分咏开州盛山十二景，其《桃坞》云：“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⑥陆诗称“何必”，韦诗说“不羨”，表达的都是类比的意思。据此可知，这类诗歌多将异地风物与武陵桃源相比较，由此求得二者的相似性，是类比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据上所述，可知自齐梁迄于唐末，桃源作为诗歌意象，以《桃花源记》及《诗》为基点，衍生出归隐、状景、仙道、迷、避等不同用法。其中隐、景、迷、避之类，与原作联系较为密切。而仙道一途，陶渊明原作似无此意。那么，桃花源、武陵与仙道之间到底是如何产生关联的？此种关联又对桃源的形塑和流变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专门研究。

三、从《桃源行》到瞿童成仙：仙道中的桃源

桃源和武陵是如何与仙道产生联系的？陶渊明《桃花源记》和《诗》当然是其源头。陶氏原作虽具怪异性质，但并未言及神仙。《记》中所载捕鱼者所见桃源人，说其先世避秦至此，因而他们实际上是避秦者的后代，并非长生不老的神仙。而且，《记》中所载桃源人，“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⑦与桃源之外的人并无不同，只不过他们“俎豆犹古法”，^⑧还保存了古礼而已。因此，桃花源与神仙发生关联，主要还是后人对《记》和《诗》的理解和接受问题。从前述张正见《神仙篇》及王绩《游仙诗四首》（其三）来看，盛唐之前桃源与仙道产生关联者主要是游仙诗。此当与《桃花源记》所出之书《搜神后记》的怪异性质，以及《桃花源诗》所言“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⑨有一定关系。不过，“一朝敞神界”中的“神”是神异、奇异的意思，而非神仙。可见后人的理解具有创造性。

从诗歌史来看，张正见和王绩将桃源作为游仙诗的题材，在后世虽不乏承续者，但不多见，仅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之一“教向桃源嫁阮郎”，^⑩及题为欧阳炯的《大游仙诗》“赤城霞起武陵春”^⑪等几首。但是，张正见和王绩的游仙诗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亦即将桃源作为仙家，桃源人作为仙客的诗歌知识。因此，接下来，我们会在唐诗中看到与此有关的各种表述。例如，“何如游帝宅，即此对仙家……无云秦汉隔，别访武陵花”^⑫；“春来武陵道，几树落仙家”^⑬；“桃源应渐好，仙客许相

①李白：《小桃源》，《李太白全集》（卷30），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3页。

②徐铉：《送许郎中歙州判官兼黟县》，《全唐诗》（卷754），第8580页。

③皮日休：《桃花坞》，《全唐诗》（卷610），第7038页。

④陆龟蒙：《桃花坞》，《全唐诗》（卷618），第7121页。

⑤陆希声：《桃花谷》，《全唐诗》（卷689），第7914页。

⑥韦处厚：《桃坞》，《全唐诗》（卷479），第5449页。

⑦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第165页。

⑧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第167页。

⑨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第167页。

⑩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全唐诗》（卷641），第7347页。

⑪欧阳炯：《大游仙诗》，《全唐诗》（卷761），第8640页。

⑫郑愔：《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全唐诗》（卷106），第1105页。

⑬包融：《赋得岸花临水发》，《全唐诗》（卷114），第1154页。

寻”^①；“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②等等。

如果仅有桃源与仙家、仙客相联系的诗歌，那么，桃源、武陵与仙道的关联并不够密切。但“桃源”还有另一种入诗方式，亦即作为唐代新乐府的诗题。总体来说，唐人新乐府既有如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造，也有通过对古乐府进行“赋题”或“赋义”的改造，因而产生“尚辞”与“尚义”等不同派别的诗歌实践。将《桃花源记》及《诗》作为改造对象，发生于盛唐。例如，李白《古风》（其三十一）：“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③综合了《搜神记》所载郑容遇华山使与《搜神后记》所载桃花源故事，极具想象力。但李诗并非新题乐府，而且诗中所言仅避秦之事，并未详述桃源人物，也未涉及仙道。因此，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王维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④

王维此作是一首典型的新题乐府，所赋以《桃花源记》和《诗》为主要内容，但又对原作进行了改写。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将原作中捕鱼者所见桃源人“白云先世避秦时乱”，改为“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也就是说，王诗中的桃源人不是当初避秦者的后代，而是避秦者本身，他们都已成仙。另一处改写是“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而原作为“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个改动，显然是为“成仙”之说作铺垫。桃源洞中所居之人，以秦汉时的姓名来称呼彼此，还穿着秦汉时的衣服，可见他们都已成仙。王诗中的“成仙”之说，当受此前与桃源相关游仙诗的影响。其创造之处在于用“桃源”命篇，以新乐府形式改写，因此产生深远影响。宋以来学者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例如，宋陈岩肖说：“武陵桃源……王摩诘、韩退之、刘禹锡、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诗，争出新意，各相雄长。”^⑤清王士禛也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⑥不过，这些说法还存在不少不确之处。如以“桃源”命篇的唐代诗人，除王维、韩愈、刘禹锡外，尚有武元衡《桃源行》及权德舆《桃源篇》。韩愈之诗题并非《桃源行》，而是《桃源图》，属于题画诗。

王维之后以“桃源”为题的诗作贯穿着“成仙”之说，但其说法又不尽相同。例如《全唐诗》所载署名武元衡的诗，题为《桃源行送友》，“送友”或为原注而误入诗题。此诗以“桃花”为主线，以“时有仙鸟来衔花”来契合仙源，以“多君此去从仙隐，令人晚节悔营营”^⑦束题。武元衡又作《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⑧可见他对武陵仙源之事很感兴趣。刘禹锡《桃源行》作于贞元年间，^⑨为其早期作品。刘诗设计了一个新的情节，说渔者跟随上钩之鱼信流而至桃花源。称桃源中人为“仙子”，这些成仙之人在

①钱起：《岁暇题茅茨》，《全唐诗》（卷237），第2645页。

②刘商：《题水洞二首》其一，《全唐诗》（卷304），第3463页。

③李白：《古风》其三十一，《李太白全集》（卷2），第127页。

④王维：《桃源行》，《全唐诗》（卷125），第1257-1258页。

⑤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

⑥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0页。

⑦武元衡：《桃源行送友》，《全唐诗》（卷316），第3547页。

⑧武元衡：《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全唐诗》（卷317），第3575页。

⑨按：陶敏据《刘宾客文集·外集》（卷8）《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诗后附刘蕖题记，系此诗于贞元间，甚确。参氏著《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1），第37页。

桃源种玉,招待捕鱼者的晚餐为“石髓”。又说渔者害怕失去原先所居之处,不愿成仙,故匆匆逃离,以致诗人憾其“尘心如垢洗不去”。诗末云:“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①据此,刘诗想象了一个令人向往但又不可触及的神仙世界。此诗显然受王维《桃源行》影响,但又与王诗略有不同。王诗重在写仙境,刘诗则重渔者与桃源人的对话交流;王诗末说渔者出洞后拟作长游,所以返回寻找桃源,比较忠实原作,而刘诗则说渔者尘心未褪,“一息不肯桃源住”;王诗中的桃源人“还从物外起田园”,过着田园生活,而刘诗中的仙人“种玉”、服食“石髓”,已远离尘世。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到桃源神仙之说的演变。权德舆及韩愈的桃源诗都是题画诗。权德舆《桃源篇》开头说:“小年尝读桃源记,忽睹良工施绘事。”接下来即对所观之图进行描述。此诗也写仙道之事:“石髓云英甘且香,仙翁留饭出青囊。”^②仙翁所留之饭,亦为“石髓”“云英”。但与刘禹锡诗相比,权诗又有不同。权诗云“相逢自是松乔侣,良会应殊刘阮郎”,赤松子和王子乔都是传说中的神仙,图中的渔者与桃源人相会,就好像松、乔相会一样,属于神仙之会。而不像刘晨和阮肇,本是凡人,因入山而遇仙。此外,权诗将渔者也写成神仙,与刘禹锡《桃源行》中的渔者为凡人不同。韩愈《桃源图》开篇即云“神仙有无何眇茫,桃源之说诚荒唐”,^③目的是证明桃源“成仙”之说虚而不实。何以韩愈会以一种反对“神仙”之说的态度出现呢?他所针对的又是什么?这就牵涉到中唐时期武陵地区道教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亦即“瞿童成仙”故事。

关于瞿童升仙故事,有两篇重要文献:一是符载《黄仙师瞿童记》,一是温造《瞿童述》。据二文所载,大历四年(769),辰州辰溪人瞿柏庭,年十四,因家乡战乱,逃至武陵桃花观,拜观主黄洞元为师。大历八年(772)夏五月,瞿柏庭从庭中大栗树旁灭化而去。黄洞元于建中元年(780)四月迁居江州庐山。贞元五年(789)十一月,复迁居润州茅山,为茅山道教第十五代宗师。桃花观瞿童升仙之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符载于大历至贞元间隐居庐山,其所述瞿童之事,当闻之于黄洞元。温造于长庆元年至三年(821-823)任朗州刺史,他对瞿童升仙之事作了详细考察,并亲自询问瞿柏庭同学陈景昕。景昕时为桃花观道士,改名通微。韦乾度元和十二年(817)曾任朗州刺史,应陈通微之请,曾作《桃源观石坛记》,可知陈通微确有其人。温造曾任右史,其以史家之笔详叙此事,足征他认为瞿童成仙为信史。据董佺《阎贞范先生碑》,武陵县令阎案闻知瞿童之事,尝拜黄洞元为师,得授“洞神正一券”。^④又据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会昌元年(841)十二月重勘桃源观所辖界址,其中提到八迹坛,“在祠堂北一百八步,瞿童上升处,足印八迹”。^⑤这是后人为纪念瞿童升仙所立之坛。是则此事影响极大,信之者不少。

刘禹锡元和间谪居朗州,曾作《游桃源一百韵》。那么,他对此事态度如何?其诗云:“列仙徒有名,世人非目击。如何庭庑际,白日振飞翮。洞天岂幽远,得道如咫尺。一气无死生,三光自迁易。”^⑥可知刘氏对此事甚为怀疑。不过,在他看来,因物所累,长生难得,若能静心修养,或亦可求。清潘德舆评此诗为“不过求退居、学长生而已”,^⑦深得其旨。元和七年至十年(812-815),窦常任朗州刺史,对瞿童成仙之事也很感兴趣。他令人绘制了桃源图,并寄至京城长安。韩愈《桃源图》说:“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

①刘禹锡:《桃源行》,《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1),第36页。

②权德舆:《桃源篇》,《全唐诗》(卷329),第3679页。

③韩愈:《桃源图》,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11页。

④董佺:《阎贞范先生碑》,《全唐文》(卷68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03页。

⑤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全唐文》(卷761),第7908页。

⑥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68页。

⑦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1),朱德慈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

斯。”钱仲联先生将此诗系于元和八年(813),并考证诗中的“武陵太守”即为窦常,“南宫先生”为卢汀。^①是则韩愈所观者,当是窦常令人所绘之桃源图,图上有卢汀题辞,故合称“文工画妙”。据韩诗首联“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及诗末“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可知韩愈对瞿童成仙传说也是极为反对的。

如何来理解上述现象?桃源本为想象和虚拟。陶渊明原作虽具杂传怪异性质,但并未直接与仙道联系。齐梁以降,桃源或武陵诗开始与仙道产生关联,起初是《神仙篇》之类的游仙诗,后来逐渐发展为以“桃源”命篇的新题乐府,遂使桃源从幽美之境和归隐之地转成神仙居所。此本属于诗歌意象的拓展和变异问题。但东汉以降,武陵地区道教兴盛。唐代崇道,此地道教更为勃兴。“瞿童升仙”一事,本质上是道教与诗歌的合流现象。桃源神仙之说形成过程中的诗歌与道教两条线索,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刘禹锡身上。刘贬朗州之前所作《桃花源》,对神仙之事一再叙说,属于诗歌内部现象。因其试图超越前人特别是王维的《桃源行》,故在神仙故事上更进一步,增加了“石髓”、种玉等各种想象。但刘禹锡贬谪朗州后,置身于现实的桃源之中,又经亲自考察,故对瞿童成仙之说深为怀疑,与此前《桃源行》中的态度判然有别。这种转变,正表明在他心里,存在想象与现实两种不同的桃源。这两种桃源也体现在韩愈身上,他在《桃源图》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成仙之说,但他所反对的并非王维、刘禹锡等人所作《桃源行》中的神仙之说,而是现实中的武陵桃花观瞿童升仙之事。前者是他对诗歌的态度,后者则是他对道童白日升仙的看法。

但是刘禹锡和韩愈对瞿童故事的态度,并未影响神仙之说的继续流行。事实是,神仙之说不仅渐成桃源诗歌的重要题材,而且不少诗人将之比附于天台刘、阮成仙故事,如“应向桃源里,教他唤阮郎”^②;“武陵桃源,刘阮天台”^③;“玉皇赐妾紫衣裳,教向桃源嫁阮郎”^④;“曾随刘阮醉桃源,未省人间欠酒钱”^⑤等。由此比附而生发出“武陵期”的诗歌意象,使之成为爱情象征。例如,李中诗:“武陵期已负,巫峡梦终迷。独立销魂久,双双好鸟啼。”^⑥薛涛《牡丹》:“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⑦此外,在一些情诗中,“桃源路”“桃源洞”“武陵溪”“桃源女伴”等语词的使用,也都由“桃源期”变化而来,如“惆怅桃源路,惟教梦寐知”^⑧;“桃源洞口来否,绛节霓旌久留”^⑨;“晨肇重来路已迷,碧桃花谢武陵溪”^⑩;“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⑪等。这种意象的衍展,因多重联想而生成。“桃源期”当由桃源神仙传说的变异所致。

四、地记与图像中的桃源

在诗歌之外,地记和图像中也有对桃源的相关记述。齐梁时期黄闵、伍安贫等人所著《武陵记》,其部分内容还保存在类书及史地著作中。例如,《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武陵记》3条,《太平广记》卷一八引《武陵记》1条、卷四〇七引《武陵郡记》1条,《太平御览》卷四九引《武陵记》10条,唐李贤注《后汉书》引《武陵记》3条。从今存部分引文来看,齐梁时期的武陵地记,显然受到《桃花源记》

①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8),第914页。

②刘长卿:《过白鹤观寻岑秀才不遇》,《全唐诗》(卷147),第1481页。

③李瀚:《蒙求》,《全唐诗》(卷881),第9962页。

④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全唐诗》(卷641),第7347页。

⑤吕岩:《七言》,《全唐诗》(卷857),第9689页。

⑥李中:《悼亡》,《全唐诗》(卷748),第8516页。

⑦薛涛:《牡丹》,《全唐诗》(卷803),第9037页。

⑧韩偓:《欲去》,《全唐诗》(卷683),第7832页。

⑨韩偓:《六言三首》其三,《全唐诗》(卷683),第7839页。

⑩王涣:《惆怅诗十二首》其十,《全唐诗》(卷690),第7920页。

⑪按:此诗题为“步非烟”《寄怀》,见《全唐诗》(卷800),第9002页。

的影响。如《太平御览》卷五四“穴”条引《武陵记》：“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蛮入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蛮人入穴，见有石梯在其旁，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霭然，行人翱翔，不似戎境。此蛮乃批树记之，其后寻之，莫知其所处”。^①又《太平御览》引《武陵记》所载《武陵人歌》：“有绿萝山，侧岩垂水。悬萝百里许，得明月池，碧潭镜澈，百尺见底，素颜若雪，松如插翠，流风叩阿，有丝桐之韵。土人为之歌曰。”据逯钦立考证，此书作者“黄开”当作“黄闵”。^②这种描写具有鲜明的六朝地记特征。隋唐时期，图经编撰开始勃兴。《唐六典》载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③因此，武陵图经在唐时也多有编撰。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所言“桃源山洞开显，庀宇兴创，神仙异境，具《武陵经》”，^④即为明证。刘禹锡贬谪朗州后，对武陵之得名曾作过一番考察，并“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⑤则其对武陵图经的利用是一个重要事实。晚唐僧人齐己诗：“武陵嘉致迹多幽，每见图经恨白头”^⑥；“春醉醒来有余兴，因人乞与武陵图。”^⑦此图亦当为武陵图经所载之图。

刘禹锡藉图经考察武陵，其举动在当时亦属寻常，因为唐代地方官赴任时，多阅读图经以熟悉当地情况。如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⑧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⑨作为地志的武陵图经，主要用于行政区划与地方治理，因而比较理性客观地记载了武陵的地理和风物。不过，据今存《朗州图经》的部分内容，图经也记载了不少神奇怪异之事。《太平广记》卷一〇一及卷三八九各引《朗州图经》1条。前条载释惠原少时曾至武陵山，射杀一孕鹿。鹿死之前说：我前世曾杀你一人，今你杀我母子二人。惠原悟前缘，落发于鹿死之处，并于此置寺。后一条说武陵县北十五里处有一古冢，相传此墓曾开，中有铜人数十，张目视，击鼓大叫，后墓门又合。由此可见，唐时图经亦有以异相尚的特点。

与武陵图经密切相关的是桃源图。前述权德舆及韩愈之诗，都是观图之作。权诗重在描述桃源仙境，多神仙之气；而韩诗则偏于叙事，对图中之景描写不多。最重要的是两人的立场不同。权氏以宣扬神仙之说为主旨，而韩氏则反对成仙之说。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权德舆所观之画，没有交代其来源。而韩愈所观，明确提到是“武陵太守”令人所绘。据此推测，两人所观当为两幅不同的桃源图。事实上，唐代还有古桃源图。舒元舆《寻桃源画记》：“四明山道士叶沈，囊出古画，画有桃源图。图上有溪，溪名武陵之源。”此《记》可注意者有三：一是桃源图的收藏者是道士。二是此为古图。三是据文中所记，此图多描摹仙境，在山水和动物外，重点是仙人：“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书童玉女，角发而侍立者十二。视其意况，皆逍遥飞动。若云十许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⑩据权德舆、韩愈的题画诗及舒元舆观画记，可知唐代桃源图所绘，多以神仙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多作“飞天”之状。此与图经所记不同。图经基于现实功用，多为实写。而桃源图则与神仙故事相联，多为想象虚构之作。显然，唐代桃源图受诗歌“神仙”之说影响，是诗歌的图像再现。据宋黄休复《益州名画

①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4页。

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8），第1022页。

③李林甫等：《唐六典》（卷5），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④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全唐文》（卷761），第7908页。

⑤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2），第70页。

⑥齐己：《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全唐诗》（卷846），第9570页。

⑦齐己：《寄顾瞻处士》，《全唐诗》（卷844），第9544页。

⑧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全唐诗》（卷385），第4340页。

⑨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第1179页。

⑩舒元舆：《寻桃源画记》，《全唐文》（卷727），第7494页。

录》卷中所载李昇《桃源洞图》《武陵溪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载荆浩《桃源图》、关同《桃源早行图》，发现宋人桃源图重山水描摹，以静为主，以隐为意，与唐代桃源图的神仙之气有明显差异。

五、“桃源”的空间与场域

上述晋至唐“桃源”意象的塑造与变异并非特殊现象，而具普遍性。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意象，是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复杂关联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但无论文学地理还是历史地理，都涉及地理空间问题。唐人在谈论桃源，或在诗歌中使用桃源一词时，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桃源进入诗歌作品，具有怎样的内在心理机制？我们该以何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地理批评”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研究视角。

法国利摩日大学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也译作“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基于福柯《他者空间》《权力的地理学》，以及德勒兹《千高原》等著作中的理论，提出“地理批评”概念。在其《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学批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中，提出空间的时间性问题。他认为空间概念的产生和使用，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不同人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开放的空间（espace）转换成封闭的场域（lieu）。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在认识和使用某一空间概念时，这一空间概念原具的多样性涵义转换成某一特定的涵义。而这特定的涵义是与认识和使用时的特殊场景有关的。由于认识和使用的时间性，空间概念也是流动的。此为空间的时间性。另一方面，空间还存在想象与虚构的现象。想象与虚构的空间，不是外在的空间，而是内心的空间。^① 此种理论，有助于上述现象的理解：

其一，桃花源本是陶渊明的想象和虚构，寓托了作者个人的观念和理想。但武陵确为现实中所具的历史地理空间。陶氏原作将桃花源与武陵联系起来，隐藏了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联结的密码。这也为后人的理解和认知提供了不同路径：一是想象的桃源，一是现实的武陵。但后人对此现象的认识，并非完全按照这样的预设进行，而有新的创造。在想象和虚构的桃源方面，以《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为基础，衍生出神仙故事。不惟如此，在现实的武陵方面，由于该地道教的逐渐兴盛，其与桃源神仙传说相结合，进而衍生出瞿童白日升仙的故事。这样一来，桃源不仅是避隐、美景的代名词，而且也成为可以成仙长生的场所。作为文学地理的桃源形象在后世不断变异，与历史地理的武陵相互结合，以诗歌的文本形式和绘画的图像形式呈现出来。

其二，无论是诗歌文本还是绘画图像，当桃源进入作者视域时，已从空间转换成场域，由此在不同作者心中和笔下生成不同的桃源。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由于场景的不同，对桃源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最典型的是刘禹锡。刘氏在未谪朗州之前所作《桃源行》，虚构和想象了一个神仙世界的桃源。但当他走进真实的武陵后，在所作《游桃源一百韵》中，对瞿童成仙故事则产生怀疑。不过，在现实的迁谪过程中，刘禹锡的内心肯定还有一个他向往的桃源世界。

其三，《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将桃源与武陵联系在一起，后人在使用时，往往将两者当成同一个事物而互相替换。因此，武陵也存在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的区别。武陵本是一个历史地名，但作为文学地理使用时，武陵等同于桃源。

（责任编辑：张 升）

^① 参看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宣言：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陈静弦、乔溪、颜红菲校译，《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骆燕灵整理翻译《关于“地理批评”——朱立元与波特兰·维斯法尔的对话》，《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

Between Immortal and Human Beings: The Shaping and Changing of the Image of *Taoyuan* in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WU Xiaping

Abstract: Belonging to the literary category of *zazhuan* 杂传 (miscellaneous legends), Tao Yuanming's *Taohua Yuan Ji* 桃花源记 (*Peach Blossom Spring*) was the basis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image of *Taoyuan* 桃源 (peach blossom spring) in later gener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aoyuan* was mainly taken as a place of secluded beauty and a place of retreat. Wang Wei's *Taoyuan Xing* 桃源行 (A Journey to Peach Blossom Spring) was the first poem which made *Taoyuan* as part of its title, and later Liu Yuxi, Han Yu and others also created works on this topic. The narratives of these poem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but on the whole they all centered on the life and stories of immortals. During the Dali Reign (766 – 779), the child Taoist monk at the Taoist temple named Taohua Guan (Peach Blossom Taoist Temple) in Wuling rose to immortality in broad daylight, and then the fairy tales in the poem merged with the Taoist stories to form a genre of *Taoyuan* stories of immortals. *Wuling Ji* 武陵记 (*Records of Wuling*) and *Wuling Tujing* 武陵图经 (*Map Guides of Wuling*) as topographical records describe *Taoyuan* more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but they also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pictorial *Taoyuan* maps are imagery expressions of *Taoyuan*, and to be exact are the imagery reproduction of the texts of the poems, so 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stories of immortals. From the examples of Liu Yuxi and Han Yu, we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oyuans* i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those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y are often unified in the mind of the poets. Based on this, it is possible to dig deeper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doing geographical criticism of *Taoyuan* in terms of the space and sphere created b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orks, an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Taoyuan*; Wuling; literary geography; historic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criticism

About the author: WU Xiap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0234).